



王徵评传

丁锐中 ◎ 著



王徵评传

丁锐中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徵评传 / 丁锐中著 . —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 2016.9

ISBN 978-7-5188-0275-3

I . ①王… II . ①丁… III . ①王徵 (1571-1644) — 评传 IV . ① K8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1323 号

王 徵 评 传

丁锐中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 100009 ）

电 话： 64095215 （ 发行部 ） 64095361 （ 编辑部 ）

责任编辑： 赛 勤

版式设计： 武俊东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170 × 240 毫米 16 开 21 印张 26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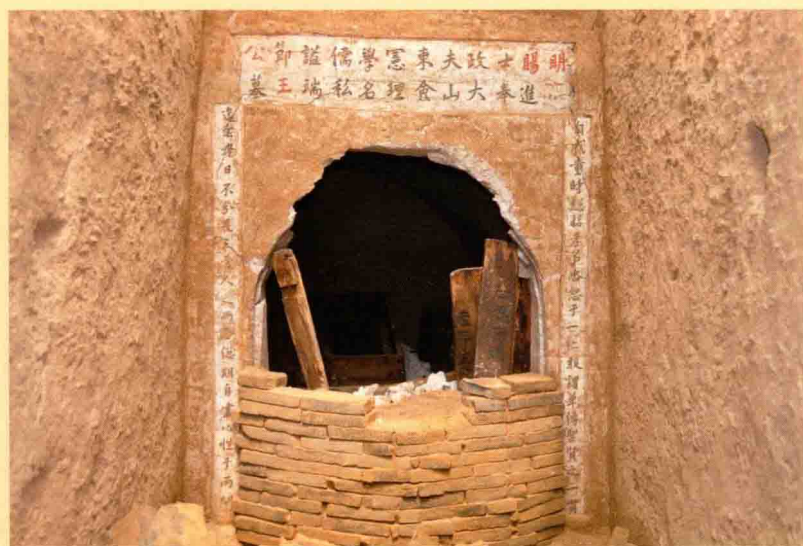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88-0275-3

定 价： 5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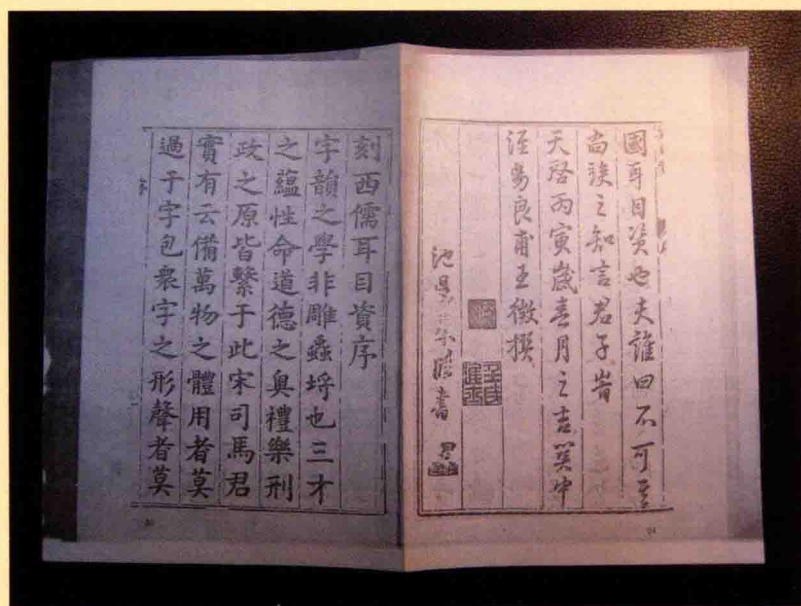
新出土的王徵墓志铭盖



王徵墓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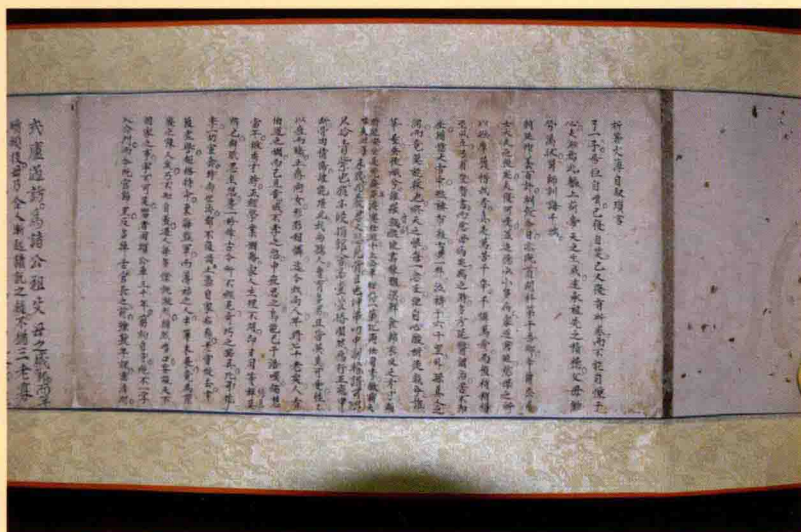
新建王徵墓园



王徵撰《西儒耳目資序》部分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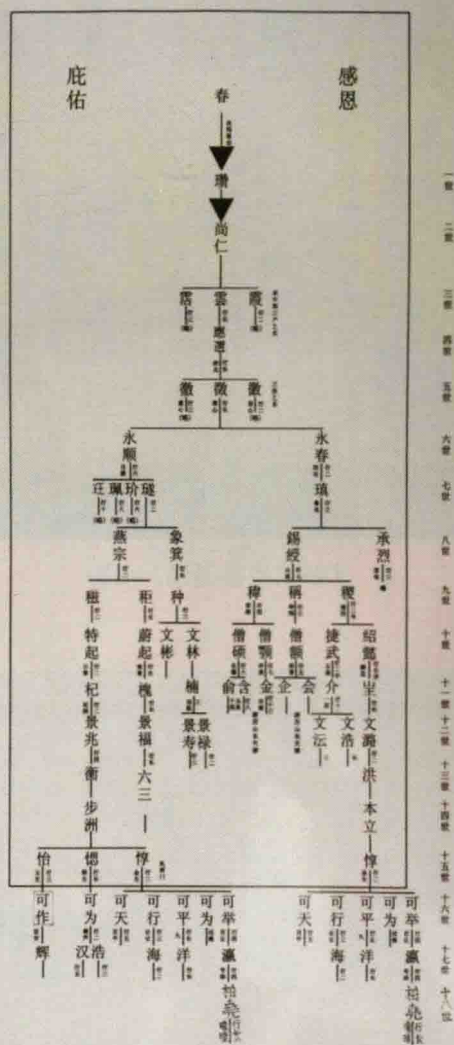


《新制諸器圖說》書影



寫本《析箸文簿自序琐言》部分

陕西省泾阳县盈村里尖担堡王氏长房族内一支世系图



自始祖至瓚祖中间象祖失传世数多少亦不知知之清者自瓚祖始故只起于瓚祖记为一世以下俱以瓚祖推而记之至始祖王讳春北宋末年由山西洪洞迁居涇阳复一年生生不息

王可举校点续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王徵第十二代孙王可举编录一支谱系图



《君子乡》石匾



《鸣珂里》石匾

序

卓新平^①

王徵是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其经历、著述和思想都曾使当时的“耶儒会通”取得明显突破，同样也折射出中西文化结构、民族传统中的矛盾冲突。西方研究基督宗教在华传教历史的专家一般认为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之间仍是一种“没有结束的相遇”，而我们今天思考并推动的基督宗教“中国化”也正是根据历史经验教训而对这一发展路径的探索，是这一相遇和对话之复杂经历的当代延续。因此，研究王徵的生平及思想对之就有着独特意义。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教，是基督宗教四次传华之中最具有文明对话蕴涵的一次，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举足轻重、令人深思。在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中，人们对这一文化交流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谈论颇多，特别是对罗明坚、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人有着深入、系统的研究。而在当时皈依天主教的中国士大夫中，以往的研究视域则主要集中在称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身上，而对王徵的探究则相对较少。其实，在这种中西对话的重要性上，王徵的经历及其思想发展同样可圈可点，不少人将王徵与徐光启相提并论，故有“南徐北王”之说。

历史上人们对王徵曾有零星研究，主要是搜集出版其著述。进入 20 世纪以来，探究王徵的意识在中外学术界明显加强。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

① 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

者向达、方豪、陈垣、柏堃、王重民等人都曾涉及对王徵的研究。尤其是“自20世纪30年代陈垣先生因纂《中国基督教史》为王徵立传以来，对王徵其人其学的研究渐为学界所关注”（林乐昌语）。陈垣撰写有《泾阳王徵传》，并且还从思想文化的交流始于语言文字的交流之角度而指出“迄今言中国人习拉丁文最先者，犹当推陕人王徵也”。所以说，自陈垣始，对王徵的探究乃有了明显的学术意义，由此也扩大了明末清初宗教思想史、比较文化史研究的范围，增加了对其重要人物的找寻。

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自20世纪80年代起，对王徵的研讨趋于活跃。20世纪80年代末，李之勤所编《王徵遗著》问世；1990年，宋伯胤编著的《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出版；2000年台湾学者黄一农所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亦在大陆学界流传，尤其是他关于王徵的“天主与妾”之专论更是引起人们对探索王徵的浓厚兴趣。2007年，邱春林出版《会通中西——晚明实学家王徵的设计与思想》；2011年底，林乐昌推出了其历时十五年之久的研究成果《王徵全集》。此外，相关著作和论文亦层出不穷。至此，学术界对王徵著述的资料整理已大致完成，初具规模。

不过，整理王徵著述的资料工作，并不意味着对其研究的完成，而仅仅是这一探讨的开端。因此，青年学者丁锐中完成的这部新著《王徵评传》乃让人眼前一亮，由此看到了王徵研究正深入发展。作者在论及自己的这一探究时表明，“本书的要旨在于，全面梳理王徵一生的经历，使得我们对王徵能有一个连续而又整体的认识，从而将历史人物置于时代环境的大背景中进行客观评述。”当然，这种历史辨识既要深入历史其内，又应超乎历史之外，其历史与现实之视域必须达到科学的交织和理想的融合。我们对王徵应有历史之还原，但更需超出其时代背景的分析与思考。

那么，王徵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大背景”是什么呢？对此，丁锐中有着深刻而独到的分析。首先，当时明朝已近末期，其国体的虚弱已使之濒临“天崩地解”之境。尽管当时有一批爱国志士关心其国运兴衰，希望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却阻挡不住江河日下，无能再力挽狂澜。例如王徵作为那时的实学派儒家知识分子，在著书立说、译介引用上也曾有“关于军国，济于

实用”的选择及“以天下国家为念”将之全力推行的抱负，想“学范文正公以天下为己任”，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怀才不遇、命运多蹇，十次会试才获进士之名，而在受任出征时又遇兵变，结果被问罪下狱，后经好友尽力周旋方得以遇赦归里，因此壮志未酬却已出局，难展宏图，最终在李自成起义军威逼归顺下为忠于明朝、保住名节而绝食死亡。其次，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已达高潮，其会通中的矛盾分歧亦逐渐明显，虽然追求“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之天命信仰的王徵以皈依天主教来企图补儒救世，希望“使儒耶会通极具巧致”，却遇到基督宗教与儒家传统的深层次对峙及冲突；王徵虽已信奉天主教却也不得不顺服儒家“孝道”，为宗族繁衍传承而纳妾，结果其思想深陷纠结，内心饱受煎熬。此外，王徵一生的信仰历经由佛转道、最终皈依天主教的过程，他虽然对佛、道多有批评，却仍试图能以“西学”来重新解读中国文化，使之能够更新、完善，由此也尝尽酸甜苦辣，深知其中不易。如是观之，王徵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只能尽其可能，希求有所作为，并没有放弃其精神追寻。这样，王徵虽身处社会、政治动荡之中，仍然尝试会通中西、圆融耶儒，盼望达致一种中西合璧的文化复兴，从而在深层面揭示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虽现实尴尬、却精神不屈的执著、顽强。

在此，丁锐中的新著生动描述了在这种跌宕起伏的历史岁月中王徵的奇特人生及其心路历程。在从儒家士大夫走向虔敬天主教徒的信仰转型上，王徵曾深受天主教传教士庞迪我、金尼阁、邓玉函、汤若望、艾儒略等人的影响。在当时会通中西的思想大潮中，王徵将其注意力首先是放在语言沟通、科技交流上，以实际、实用、实效为其重点之探。他为此积极参与了编印金尼阁《西儒耳目资》的工作，故而成为陈垣所言“中国人习拉丁文最先者”。丁锐中认为，《西儒耳目资》“这部著作凝结了中西学者的心血”，“真正为中西文化、科技等系统打开了语言之门”。有了语言这一沟通工具，王徵进而借助于西方科技文献来探究“用穴、用气、用水、用风”、“用小力转大重”的技术，希望藉此推动中国科技发展，形成有助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实学”。不过，王徵并没有止于“实用”，而也尝试在精神信仰上同样能通过语言的会通来达到“信仰、文化的会通”，并且撰写了表达其信仰意向的《畏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天爱人极论》，即以“畏天爱人”这一宗旨来通贯“天人体用”的中华文化传统，使之增添“天学”蕴涵。对这一方面，作者亦有精彩的分析，指出王徵的“畏天”乃“标示了一种独特的信仰祈向”，而“爱人”则“表明了一种对仁爱的全新理解”，因而“畏天爱人”乃“是崇教儒者的信仰融会，亦是对传统儒家‘天人关系’的拓展”。

除了对王徵个人信仰体验的剖析之外，丁锐中进而还从中西交流的大背景中更深入地阐述王徵此论的文化意义，认为王徵于此而“重新阐释了中国经典术语”，“更深入地融合了中西方文化”，“他所采用的西学帮助他完善了中国经典著述的内涵”，由此证明中国儒者“能够通过吸引外来文化赋予自己传统文化新的含义”。中西文化交流一直充满着张力，却又魅力不减，不少中外有识之士都为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大家希望的当然是一种双赢的结果，而力求避免卷入文明的冲突之中。这种努力并没有终结，而王徵在其最初的探索中则也有着筚路蓝缕之功。

在这部《王徵评传》中，丁锐中不仅在微观上对王徵的生平、思想及成就有非常翔实的展示，而且还从宏观上结合明清史实及整个中西交流史的大气候来评说王徵的作为，评价其历史意义。这样，就使我们可以具有超越历史的反思，并联系当今现实来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获得审时度势的睿智，正确、恰当处理好中外交流的复杂关系。陕西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中外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频仍，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留下了王徵这样的案例和由其引发的沉思，这一宝贵历史遗产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推进“一带一路”的发展仍然可以提供借鉴和对照，而且在有效帮助我们正确、妥善处理好宗教问题上尤为必要。此外，此书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由王徵所写以及研究评论王徵的宝贵史料，使我们既感到其论的历史厚重，亦能体会其思的精神深邃。这不仅为我们认识王徵的历史价值提供了明证，而且还为我们当下体悟整个中外交流的文化意义带来了启迪。

是为序。

前言

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52岁的王徵第十次参加三年一次的京城会试，终登进士第。时值晚明社会危机四伏，传统精神支柱溃烂不堪，往日权威不复存在。官吏腐败，天灾不断，盗贼迭起，整个社会奢靡淫纵，道德水准空前低落。王徵利用会试机会，以西安府举人的身份，向朝廷上疏“为奴氛日炽，人心动摇，敬陈祈天固本简要三事”，“三事”即“一在挽回天意，一在固系人心，一在添设城守”，旨在“以报朝廷三十年来作养之恩，共游亿万斯年太平之福”。

陕西承宣布政使司西安府泾阳县举人王徵谨揭：为奴氛日炽，人心动摇，敬陈祈天固本简要三事以佐末议事。

徵一介书生，叨中万历甲午科本布政司乡试，历监谒铨，已考县职。今当会试来京，偶值东事倥偬，蠢尔奴贼，豕突过河，广宁一带，闻皆失守。不但封疆日蹙，山海之保障难凭；抑且都城剥肤，宗社之阽危可畏。所当急议备御长策，巩固皇图者也。方今条陈备御，章满公车。然而浮泛者固难尽行，费巨者又难猝办。徵不揣微贱，窃伏思惟，事有至紧要、至简便，在我皇上一举念而可转，在群有司一料理而可集者，大端盖有三焉。徵请昧死言之：一在挽回天意，一在固系人心，一在添设城守。

何谓挽回天意？从古治乱相寻，谓之天运。至于殷忧儆戒，实系天威。《诗》云：“畏天之威。”又云：“天之方蹶，无然泄泄。”夫君道首称敬天，即时当泰宁，尚不敢不畏天命，矧兹天威已赫，尚可泄泄然，不亟加恐惧修省乎哉？恭闻皇上见边报孔棘，业已不

胜警惕。大小臣工，亦罔不惴惴靡宁。第不知实动吁天哀悔之诚，与夫祈天挽回之念否？自昔大风解围，冰坚众渡，与夫霜飞星徙，天人感应之常，载在经史，徵不具论。徵曾闻海外有一小国，为强敌所围困，其势将亡。维时国中一大德人仰蹠。祈救于天。交战之顷，忽有无数蚊虻。入敌兵马象鼻中，马象惊跳回奔，遂大败溃。此小国遂以获免。小国如此，何况天朝？一人回天之力如此，何况圣主之转念？我皇上圣明御宇，法祖勤政，何曾有所失德而不为皇天之所笃佑？即百尔有位，亦皆帝心简在之贤。果能齐心祷悔，痛洗从前悠悠忽忽之心肠，另换一番卧薪尝胆之干局。用一人必当天心，行一事必合天理，诛一人不稽天讨。毋敢戏豫，毋敢比周，以诚意祈祷于皇天。天心一转，何物小丑不立时殄灭也哉？或有难徵者曰：“如此则闭门修斋诵经也而可乎？”徵应之曰：“淫祀无益，读圣贤书此理甚明。祖宗以来，制勅之词，首称奉天承运。夫但曰奉天，不曰奉佛奉道。盖天子者，天之子也。呼吸相通，灾祥立应。子有急难，不父是吁而他有所吁，父不救又谁救之哉！”故徵以挽回天意为第一议也。

何谓固系人心？今天下人心不敢谓离叛，然亦涣散甚矣。平昔重文轻武，致战士无死敌之志。又不肯破格用人，致豪杰无向用之志。迨又征调加派，骚动海内，民穷财尽，囂然丧其乐生之心。不轨奸民，且将千百成群，伺隙而起。今日人心，诎易收拾？谓宜仿唐臣陆贽罪己谕民之诏，切实哀痛，出自肺腑，明告中外，令人读之有扶杖流涕光景，方是圣天子之德音，方足鼓四方之忠义，方可维系。将涣之人心。至于都城之内，万万生齿鳞集，虽仓储足备缓急，而一切煤薪杂粮，日用诸物，大率取给城外。倘或有急，闭门能堪三日无食用乎？能保穷民不哗噪先自溃乎？徵愚谓宜趁今贼情尚远，即预发帑金数十万，以付心计大臣，厚估以招各商，收买合用煤粮诸物，蓄贮官房官地，预备闭城乏绝之用。先行五城御史将

见在京城人户，分为上、中、下三等。临急之时，诸物涌贵。上等入户比原价量增什二，不为亏累。中等人户只照原价平卖，下户则量减什之一二，以示圣恩之周恤。至于极贫小民，强壮者投军受饷，孤弱者另从赈恤，又在临期酌处。总之要使居民共知有备，坚其固守之心，不致闻风惊溃。此关系之最大者也。说者谓朝廷官帑有限，既发如许军需，安得再有此项费用？不知兵饷空捐十万，今日竟成何济？闻辽阳破时，城中官贮、商贮与富贵家私贮钱财，不翅巨万，皆为奴酋所有，财安在耶！向使平日施仁施义，饱士饱民，一旦有急，同力固守，詎至受祸如此之惨？而况官买官卖，本仍不亏。虽曰上户少而下户多，不知财虽散而民则聚。只要出纳分明，需捐弊塞；穷民得济，心自不离。从来人心不固，纵有金城汤池，无所用之。故微愚谓必人心安固，而后可言城守也。

何谓添设城守？都城之内，九庙在焉，皇居奠焉，千官万姓萃焉。平日无事尚厝户牖之防，矧今东藩尽撤，北虏垂涎，尚可处堂自怡乎！猛将谋臣分区坐守，悉有成规，无容微赘。第闻城守营军不敷垛口之用，较之嘉靖庚戌又多外罗城四十里，为力愈难。未免派离丈余，周凿坑塹，广可二丈，深则二丈有奇，为敌台之外护。每台用军不过四五十人，而一台可守三面，用人少而所御广。若用机关、毒弩，更可减省多人。精妙火器傍地冲胸而发，足使千步之内流血成渠。城上之人，只令远望招呼，接递饭食器械，省人省力。但使号令严明，却似寻常无事一般。此台就城一面，相其冲缓间设。每面多者不过建三四座而止，是周城不及二十座，而守御已大备也。更将玉河长流之水，从下流水口截筑石堤蓄水，周灌城濠，令其满而后溢。此则高城深池，更为险固。今之议者，或欲砌筑炮台，或欲多筑营盘，费皆不貲，久乃可就。如微愚计，则皆可取办于旬日之间。人工砖价，计估有限。况且一劳永逸，亦何靳而不为也。微愚又有师传活动兵轮一法，用人不多，城外遥望并不见人，止见垛

口之内，满城枪刀转动。更有友人所制活动撞木，可上可下，可行可止，其机最迅最猛，所费亦不甚多。悉可制以护城。又有徵愚自制不用人而万弩齐发之弩机，不用火而万炮齐发之火机，亦可密切制造，以备要害设伏之用。凡此诸具，不敢自诧为奇。恍蒙庙堂之上采及蒨莠，试而后行，窃谓不无小补。

至天意、人心两端，言本寻常，实关宗社大计。惟愿我皇上与诸大臣设诚致行，以为挽回收拾之大机括。其城守等具，征虽一介贱儒，愿辍雕虫，粗效狗马。第事权经费，当须任一督理之人。徵愚夙闻光禄少卿李之藻忠勤不贰，廉干无私，见理城守军需。如果徵言可采，简命斯人主持提督，而徵得以布衣从容谋议其间，相与悉心调度，竭力奔走，或者勉收薄效，以报朝廷三十年来作养之恩，共游亿万斯年太平之福。如蒙圣明俯纳，伏乞敕下兵部，详议题覆施行。徵敢冒天威，不胜惶悚待命之至。为此除具奏外，理合具揭，须至揭帖者。^①

奏疏中字字可见王徵对天道信仰的坚守，对世事人心的察明，对朝廷的赤胆忠心。此疏虽未上奏，但这就是王徵对当时现实的思考和发自肺腑的心声。从一个侧面，我们已经开始对王徵有所了解。也就是在这一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逝世十二年，王徵受洗入天主教有六七年，66岁的杨廷筠奉教十一年，61岁的徐光启奉教十九年，58岁的李之藻奉教十二年。正当时，中西异质文化从相遇到交流，开明之士与东来教士切磋学问，互通有无。

王徵（明隆庆五年生，崇祯十七年逝世，公元1571—1644年），西安府泾阳县鲁桥镇尖担堡（今陕西咸阳市泾阳县安吴镇王家堡）人，字良甫，又字葵心，号了一道人或了一子，又号支离叟等，天主教圣名斐理伯（Philippe）。

^①（明）王徵：《为奴氛日炽人心动摇敬陈祈天固本简要三事以佐末议事揭帖》，柏堃编撰：《泾献文存》卷一，民国十四年。见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103页。

王徵 24 岁（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乡试中举，52 岁（天启二年，1622 年）会试登进士第。王徵从中举到成进士，十上公车，三十年的仕途追求很可能是其用心于“奇学”所致。王徵很可能于会试期间，通过友人获得庞迪我的《七克》且在北京接触西方传教士而受洗入教，据考证王徵入教不会早于四十五岁。王徵曾任直隶广平府、扬州府推官和山东按察司佥事辽海监军道等职。后因辽海兵变，王徵受牵谪戍幸得遇赦，晚年归乡田野，捐资于鲁桥镇建造教堂，且践行天主教信德。王徵为官期间与外国传教士合作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著作，于晚年更加积极整理出版有关著作。在乡间创办“仁会”，以赈灾救贫。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攻破西安以后，派使邀请王徵，王徵以死相拒，表明忠于明廷之心，得知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消息，遂绝食七日而亡，乡谥端节先生。

明末清初之际，对于华夏民族来说，是一个革鼎的时代，又是一个西方宗教与文化输入的时代。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的浪潮中，天主教与儒教第一次深刻交锋。由此，一批热衷于学习西方文化和知识的儒者，逐渐由好奇天主教到受洗成天主教徒。这些受洗入教的儒者，一般被称为儒家基督徒。其代表人物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韩霖、王徵等。其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是南方地区的受洗入教者，王徵等是北方儒家基督徒的代表。南北儒家知识分子的儒家信条是一致的，其受洗入天主教的机缘动机及信仰追求有明显差异。

纵览王徵研究成果，清朝时期，就有学者为其写传，“其着眼点全在事亲、从政、孝义、死节方面”。近代历史学家研究王徵，从黄节的《王徵传》^①、陈垣的《泾阳王徵传》^②、方豪的《王徵传》^③到刘仙洲的《王徵与我国第

① 黄节：《王徵传》，见附录二。

② 陈垣：《泾阳王徵传》，见附录二。

③ 方豪：《王徵传》，见附录二。